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75期（民國101年3月），213-22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 香港：三聯書店，2010。XX+541頁。

陳永發\*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第二集出版了。此書與第一集相同，也是文章匯集，其中二十一篇為新作，四篇為舊作，主要都以蔣中正日記為最重要史料，仔細還原蔣參與歷史大事的一些經緯。全書內容豐富，曉暢易讀，但畢竟為論文集，並非首尾一貫之傳記，故不免散亂。為減少論文集的雜湊感，也為方便讀者閱讀起見，作者討論新近在美國公開的蔣日記及其史料價值後，便將二十五篇文章分成六編，按時序呈現。第一編談國共關係，第二編談對日抗戰，第三編談對外關係，第四編談國內政治，第五編談遷台以後，第六編談婚姻家庭。作者尋尋覓覓，撥雲見日，確實找尋到比較真實的蔣介石，有助於我們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理解。

本書延續第一集的基調，仍強調把顛倒的歷史顛倒回來，尤其針對中國大陸對蔣的誣蔑和醜化進行有力澄清，所以呈現的蔣不是人民公敵，而是愛國領袖。這個真實的蔣既非貪權戀利、毫無政治理想的土皇帝，也非出主入奴、專門伺候帝國主義主子的洋買辦；既非面對強敵、徒知聞風而逃的軍事懦夫，也非面對國際強權，唯知搖尾乞憐的哈巴狗；既非對官員貪腐與暴虐麻木不仁的獨裁者，也非對人民苦難熟視無睹的野心家；既非不解風情、僅知追求美色的登徒子，也非不受私情和公義之間矛盾煎熬的粗暴父親。他是強烈愛國主義

---

\* 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者，自認為革命家，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原教旨的理解，強烈反對階級鬥爭，對中國命運有捨我其誰的堅持，領導八年抗戰，有功於國。因為第一集已就蔣青少年時代的生活有所著墨，故此書以 1926 年的國共關係開篇。

就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來說，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必須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進化原則，共產黨自認為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為打倒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實現社會主義（等於消滅私人財產制度）的理想而奮鬥，所以共產黨是革命；國民黨反對共產黨，當然是反革命。作者無意認同中共對革命一詞的獨特定義，從而採用一般理解，以之等同為任何反對東西方列強壓迫、致力使中國全面迎頭趕上西方的奮鬥歷程，故極易穿透中共革命和反革命二分法的迷霧，直探歷史真相。他特別問道，兩次國共「合作」期間，蔣中正抵抗帝國主義和日本侵略，有何理由罵他反革命！從此出發，作者強調國共兩黨均為愛國，卻因為思想、政治和政策主張之不同，而相互競爭，甚至不共戴天。蔣相信，中國革命操之在我，中共挑戰其領導權，故限共和反共乃為勢所必然；中共反擊，亦屬理所當然。作者認為這是國共兩黨水火不容的基本原因。其實此一解釋可翻轉過來說，中共在兩次國共合作中，即便是「寄人籬下」，也決不放棄其獨立自主性，尤其不放棄其主導中國革命的決心，因此蔣之限共反共，毫不令人驚訝。總之，國共兩黨均有強烈主導歷史的使命感，即便兩黨主觀上均熱愛和平，也必定會走向武裝競爭。

## 一、國共關係

本編共有四篇論文。首篇指出，蔣中正為爭取國共「合作」架構下中國革命的領導權，曾於 1926 年年底北伐正如火如荼進行期間，派親信邵力子到莫斯科參加一次重要會議，特別要求共產國際與其建立更密切之關係，並承認國民黨的革命領導權。對此，共產國際採取兩手策略，一面極力拉攏蔣，一面仍責成中共清除統一戰線中的資產階級，藉以確保所謂工農階級（共產黨）的領導權。本文對邵未詳細回報，蔣便已決定清黨一點，含糊帶過，僅突顯第一次

國共「合作」帶來的光怪陸離景象，忠於共產黨的跨黨黨員竟然代表蔣，而國民黨組織部長竟然代表中共，互爭革命領導權，角色混亂。黨內有黨，毋怪乎蔣採取激烈的清黨措施。

次篇泛論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分裂，強調兩黨均立志「拯救祖國，振興中華」，但因思想、理論和策略不同，故有革命領導權之爭。令人訝異的是，文章呈現蔣不得不清黨之勢後，卻在接近結論之處，陡然轉而強調兩黨不難通力合作，為兄弟之爭，並強調毛澤東從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中學得教訓，故抗戰爆發後改採黨外合作方式，更公開宣布三民主義為中共當日所應奉行，以致合作框架保持到抗戰結束為止。

接下來的一篇則具體討論抗戰時期的國共關係，思路陡變，開宗明義即指出，兩黨在此次合作的框架下，實際並未停止革命領導權之爭。盧溝橋事變後，國共關係之所以由密切轉為緊張，即是因為毛大肆擴展軍事和政治力量，導致多疑的蔣採取限共和反共策略。其實，抗戰爆發之前，蔣已無意讓中共保有獨立自主的軍事和政治力量，尤其不願意看到其領導人繼續領導，故企圖以兩黨合組新政團共同參政為誘因，促成中共自動繳出全部政治和軍事本錢；只是後來抗戰爆發，無法再堅持原有談判條件。此文嚴重低估兩黨談判過程中，國民黨四項「要求」和共產黨四項「保證」之間的談判距離，更令人訝異的是，作者竟然認為前者「要求」放棄階級鬥爭思想與後者「保證」停止土地革命政策為兩黨共識。至於強調毛澤東 1938 年在一次會議中對國民黨和蔣中正有很高的評價，卻不提此次會議正是毛挑戰黨內溫和派（王明和周恩來）主張，鼓吹全面積極爭取抗日統一戰線領導權的開始，不說明毛的兩手策略，或有礙讀者對蔣政治決策能力的評斷。

末篇指出，1943 年第三國際解散後，蔣數度欲派大軍進剿陝北，卻深受國內外輿論箝制，亦毫無速勝把握，故不敢造次；對國共雙方在諜報戰中的表現，作者點到而未深究，到底為何蔣在知彼方面遠不如毛？深究此點，可理解蔣毛統治之差別，更不難發現毛藉口國民黨進攻，製造邊區軍民的危機感，發

動了以青年知識分子黨員為主要對象的搶救失足者（國民黨特務）運動，順利達到加強黨員忠誠的目標。

## 二、對日抗戰

本編有四篇論文，均針對中國大陸積非成是的偏見，證明蔣中正在民族主義方面非但大節無虧，反而領導抗日有功。首篇討論不抵抗主義。過去中共一直強調 1931 年 9 月 18 日晚日軍攻打瀋陽北大營，蔣下令不抵抗，以致東北失地千里，並出現滿洲國傀儡政權。作者承認蔣有不抵抗主義一詞的發明權，也承認蔣若親處前線，十之八九也不會選擇抵抗，但他也清楚證明，所有言之鑿鑿關於蔣下令不抵抗的故事均屬向壁虛構，如同張學良所坦承，下令東北軍不抵抗的乃是其本人，他事前甚至早已收繳駐軍武器，軍隊又如何抵抗？蔣的確默認和贊成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但無理由要他代替張學良受過。

次篇討論蔣的持久戰思想。過去中共一直強調蔣此思想不過拾毛澤東之牙慧，其本人並無抗戰致勝之策略，更無抗戰到底之決心。此文卻指出，儘管毛在 1938 年 5 月發表〈論持久戰〉一文，但蔣並無剿襲問題，其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取時間之觀念，乃深受部將陳誠和白崇禧影響。此文亦指出，1939 年底國軍召開南嶺會議，國共兩黨之間有軍事交流，此後中止。可惜作者並未告訴讀者，蔣到底何時讀到毛這篇文章，當然也未針對兩人的持久戰思想進行比較，更不可能指出，武漢棄守前夕，王明和周恩來仍高喊武漢是中國的馬德里這個口號，主張繼續死守，而蔣、毛兩個死敵，反倒英雄所見略同，都反對決一死戰。作者的討論令人想起，蔣在 1948 年底所謂三大戰役前夕，首度詳閱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對毛在抗戰初期這篇回顧第一次國共內戰的軍事論文，頗有讀後心得。其實蔣自己在第一次國共內戰中亦曾撰有〈剿匪手本〉，抗戰甫勝利即視之為破敵秘笈，專機送往晉東南，供與共軍爭奪勝利果實的閻錫山參考。如比較兩文，作者應可突顯蔣毛兩人軍事思想的優劣長短，增加我們對蔣的理解。

第三篇討論蔣對汪精衛出逃的應對。過去中共總是詆毀抗戰時期的蔣汪兩人為失敗主義或投降主義者，蔣表面上抗日，實際則縱容汪出走重慶，到南京成立傀儡政府，以便彼此唱和，上演雙簧戲。作者則清楚證明，蔣汪之間確有權力和地位之爭，對抗戰也確有主和與主戰之嚴重歧見。汪之出逃，有不計代價之嫌，甚而不惜削弱抗日陣營，企圖拉攏西南實力派軍人，成立第三勢力，再向日本求和。惟西南實力派軍人拒絕聆聽，汪毫無籌碼，只好在談判桌上任日方宰割。蔣則認為日本的和平條件早已超出中國可以接受的範圍，所以堅持抗戰到底，決不為追求和平而犧牲民族利益與尊嚴。末篇專就桐工作進一步說明蔣的抗戰決心。所謂桐工作乃是日本軍方在香港與宋美齡兄弟「宋子良」化身進行和平談判，過去中共一直視此為蔣缺乏抗日決心之鐵證，作者指出其實這是中日兩國情報人員間的接觸戰，日人希望根據中國不能接受的條件結束對華戰爭，蔣則希望偵測日本繼續作戰的決心，並據以離間日汪關係，推遲汪精衛政權的成立。

### 三、對外關係

本編篇幅最大，共有八篇文章，但說服力不足。過去中共一直批評蔣是法西斯主義者，作者對此以三篇文章突顯蔣的反希特勒立場，特別指出，蔣在1940年德國大敗英法聯軍後，發表拒絕加入法西斯陣營之建言，並在1943年阻止德日兩國軍隊在印度會師，隨後更動員德國內部反納粹力量刺殺希特勒。平心而論，蔣在歐戰形勢一面倒向德國之際，堅持親英美外交路線，洵屬明智，但若要證明蔣是強烈反法西斯主義者，對希特勒深懷敵意，則似需更堅強之證據。抗戰初期蔣曾極力爭取德國軍官和軍火，對德國的紀律與效率亦深為佩服，所以派次子緯國赴德留學，亦由他參加希特勒入侵捷克的行動。蔣拒絕聯德建議，並不表示他已無意繼續爭取希特勒德國的軍事援助，然則1940年德、義、日三國迅即締盟之後，此一主張於今看來，其不切實際，已不證自明。至於阻止德日會師和刺殺希特勒，則事屬誇張，蓋即令蔣有意如此，亦無能力。

作者提出之證據頂多顯示，蔣的下層官員曾和希特勒逮捕的反納粹人物之間有所往還而已。隨後幾篇文章指出，蔣深惡英帝國主義，痛斥英國介入西藏事務；蔣濟弱扶傾，慷慨協助韓國和印度爭取獨立，倒是證據充分。最後一篇根據史迪威的性格，駁斥羅斯福總統指示擬定暗殺蔣中正計畫之說，認為全屬史氏本人憑空捏造。此一推論，恐高估史氏之膽量，也低估其對美政府體制的忠誠度。我的猜測是，羅斯福可能未經深思，即貿然呼應史的建議，要求擬定行動方案！史拿雞毛當令箭，煞有介事，其實暗殺盟國元首，雖是冷戰時期美國總統的慣伎，但警告下屬不要把蔣當成非洲地區酋長看待的羅斯福，在真要付諸執行時，卻踟躕不前了。

#### 四、國內政治

本部份共有四篇論文，篇篇均有特殊發現。有兩篇以蔣連襟孔祥熙為主角，一篇關於 1942 年底孔女運洋狗及其激起之反孔運動，一篇關於傅斯年在參政會質詢孔以官價購買黑市漲成天價的美金公債案。最近大陸通俗歷史作家岳南著有《陳寅恪和傅斯年》一書，也提到這兩件事，但筆下仍有以訛傳訛之處，對蔣處理這兩個案件中的角色語焉不詳，卻一再冷嘲熱諷。楊天石則清楚證明，飛機接運大洋狗的新聞誇大不實，實際僅接出倉皇出逃的孔家女兒。對於此一假新聞激出的昆明反孔運動，作者慶幸其經過適當澄清和疏導之後以和平收場，但遺憾蔣未能從中讀到警訊，總以為學生愛國運動背後有政治陰謀，不知乘機徹底改革。關於孔乘機大發國難之財，作者認為鐵案如山，但也清楚指出，蔣並非一味包庇，在詳閱證據之後，曾大發雷霆，甚至以不堪字眼責罵孔。不過作者仍不曾詳細解釋，為何蔣害怕追究本案會危及其統治？不正是因為對此案姑息，終致摧毀他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嗎？

蔣如何處置二二八事件，也是重要歷史課題。中共過去總強調二二八事變是當時中國各地反抗國民黨腐敗統治的一環，造反有理，而在台灣則有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出面定調：蔣是二二八鎮壓台灣人民的「元兇」。作者則說明事

件不僅有官逼民反之一面，且有亂民殺害無辜、攻打警局、搶奪軍械、主張台灣由聯合國託管和獨立之其他面相；蔣處理事件強調懷柔寬大，不過缺乏貫徹決心，對陳儀函電透露的強力鎮壓訊息竟視若未睹，及至陳儀在增援部隊的支持下血腥清鄉，再欲亡羊補牢，已經糾正無及。蔣中正的領導統御顯然問題重重，可惜對此作者並未深入分析。

末篇再次討論國共兩黨思想、理論和政策上之差異。國民黨所信奉的三民主義基本上是社會改良主義，內涵是節制私人資本和發達國家資本，實行減租減息和耕者有其田。惟蔣過於重視社會秩序之維護，儘管他個人同情工農，討厭資本家，卻始終不能改善工農生活與命運；另一方面，又造成「國家壟斷資本和官僚資本」，以致「私人資本的發展受到擠壓和窒息」，所以在國共內戰後期民心盡失，連帶軍隊慘遭敗北。作者深悉，北伐以來中共一直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解釋三民主義，毛且冠之以新民主主義名目，將之等同於其最低政綱，待其實現以後，就要根據斯大林的經驗，實行社會主義，消滅私有財產，實現這所謂最高政綱。如此，則作者指責毛在中共建國以後立即重犯「左」傾急性病和迷信階級鬥爭兩大「錯誤」，不免令人錯愕。這不正是馬克思主義化的三民主義的具體落實，也不正是中共所謂革命的應有之義嗎？

## 五、遷台以後

此部份共有三篇論文。其中最有意思者是蔣中正的反省，作者認為蔣的最大錯誤是不會全力實行民生主義與民主政治，有趣的是，蔣的反省卻偏偏著重在外交失敗和美國背信棄義，忘掉外交本是內政的延長，內政不修，卻一味期望外交成功，美國給予援助，實乃倒置本末。尤其為討好美國，不顧前方戰事緊急，以內政服務外交，驟然實行憲政，更是自貽伊戚。此文提到蔣虔奉基督教，有時至迷信程度，似乎以此為蔣反省發現的一個重要失敗原因，其實這是作者本人之敏銳觀察。蔣喜歡以一切榮耀歸天父，或可避貪天之功，然而遭逢厄運，動輒向天父禱告，也難免不問蒼生問鬼神之譏。作者並未深究蔣之宗教

信仰與治國之關係，故未探討另外幾個相關議題：蔣之理學修養到底與其宗教信仰有何關係？又對他一生事業之成敗到底起何作用？這裡引用蔣中正日記 1946 年 4 月 11 日條：「常以『獨親天父之靈與生生不息之意』二語在念，又以孟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之語為訓，乃悟求心即所以求天父之靈，即聖爻於方寸之中心。鄭板橋所謂『不生氣不著急，多快樂多歡喜』，乃即養吾生生不息之意，於活潑之地則何生氣著急之有哉。吾於此次共匪（原文）之刺激與橫逆能不加計較，而以泰然處置之，其乃求心而不動心之謂乎。」例子未遑多舉，但不難想見，研究蔣中正之一生，不可不究心其基督教信仰與性理學修養，以及兩者之關連。

第二篇平實談論蔣 1949 年下野到 1950 年復職的經過。第三篇強調蔣反對用原子彈襲擊中國大陸，顯示其有所不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可惜此文鎖定主題，而未討論蔣對發展原子弹研究的戰略考量。其實，1950 年代蔣曾為此力邀物理學家吳大猷回台恢復中研院物理所，然因吳氏反對研製原子弹，才另請梅貽琦回台恢復清華大學，購置核子反應爐，從事原子能的基礎研究。蔣固然反對在中國大陸使用原子弹，卻似乎極在意其嚇阻功能，所以遷台後極力促成原子弹研究。台灣的原子弹研究，在其子蔣經國時代一度進展神速，後因美國潛伏在台灣的特務揭發，卒致功虧一簣。

## 六、家庭生活

本編僅有兩篇文章，一談夫婦之愛，一談父子之情，均令人感覺到蔣的人性一面。作者不僅對蔣先前三次婚姻觸礁如實說明，也對他和宋美齡相識相愛的經過據實敘述，特別更提到宋如何為夫分憂解難，有力駁斥了蔣好色、宋愛權的政治婚姻說。不過有些披露，固稱婚姻美談，卻著實令人驚訝。1930 年之中原大戰，攸關蔣在政壇上的生死存亡，大軍後勤和軍餉問題竟然仰賴愛妻協助，實屬匪夷所思。日後國共第二次內戰蔣不能速戰速決，軍費更加龐大，導致超級通貨膨脹，百姓離心離德，丟掉大陸。蔣中正為何不能早在中原會戰

學到教訓？難道他認為下次戰爭中其夫人仍可扮演同樣後勤支援的角色？另一篇說明蔣對兒子的親情，鼓勵青少年的兒子到蘇聯學習，在自己走上反共反蘇道路後，對兒子的思念之情卻與日俱增。儘管承認地方自行訂定的條約或釋放共產國際特務，都可以拯救流放在西伯利亞的愛兒，卻因為國家尊嚴的考量而斷然拒絕考慮。

作者引用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闔日記，注意到他對蔣宋婚禮的觀察，惜卻忽略了其中饒有趣味且更加重要的幾則資料。1927年9月5日條略為：是日下午，往訪宋子文於其上海寓所，未見主人，卻獨見其妹宋美齡，「云有事相商，則為介石結婚事，子文反對，欲吾斡旋。此等事非外人所能與，然吾與介石、子文皆相識者，乃許以設法疏通而出。」9月8日條略為：政務繁忙中「吾與汪、宋同車，具以其妹所託告之，不能回所執也」。9月26日條：「晚，作書與子文、庸之，言蔣婚事，事不干己，而數數如此，他日恐將受埋怨矣。」國民黨高層過去盛傳，宋美齡原有意委身於譚，為其續弦，遭譚婉拒之後，才退而求其次，委身於蔣。譚的日記證明，類此政壇小道消息，即便非空穴來風，卻有貶低蔣宋婚姻為單純權錢交易的用意。

## 七、結語

作者出版本書第一集後，本人曾在書評中指出，就找尋真實蔣中正的目的而言，他已經完成把蔣從政治糞坑中拉回真實歷史的階段性任務，未來任務應該是為蔣作一完整傳記，而無論學養、見識或是文筆，第一集都已證明作者是目前華人學界最資格的歷史學者。第二集內容雖然維持同樣水準，卻仍是一本論文集，初拿到手頗感失望。讀完〈自序〉之後，知道作者計劃將繼本書之後出版第三集，至於「全面的、綜合的分析，請俟之異日」。對作者一步一腳印，耐心先做專題研究，再徐圖全面加以綜合的想法，十分佩服。但是想到最近美國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出版的蔣中正傳記及其中文譯本，仍不免著急。對蔣這位曾經領導中國革命的人物，為何中國學者始終不能拿出一本同樣值得

廣泛閱讀的全傳？作者此書確實還原了北伐以後蔣的許多重要面向，增進世人對蔣的瞭解，但是受限於論文體裁與問題意識，閱讀的興奮感不如從前，獲益良多的感覺隨之減少。在此重覆對一本全面綜合性蔣中正傳記問世的期望，不知能否免於嘵舌之譏？